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

姚建华

摘要 不同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以新闻工作者、动漫创作者、自由作家、出版社编辑人员、新媒体企业实习生、视觉特效师等不同面向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为研究对象,揭示出他们的劳动不断被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紧密相连。本文从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三个过程出发,梳理了该领域的理论聚焦,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尤其是对“无酬劳工”“不稳定性”等概念的历史性和系统性分析,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化了其批判的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以及孕育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新的实践,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传播劳动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12-0116-07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8.12.016

作者简介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433

随着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与媒介生态的变迁,大量媒介产业的劳动者积极或被迫转移到数字化的进程中,数字技术也因此渗透到他们生产和劳动过程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同,本文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从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所呈现出的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三个过程出发,梳理该领域的理论聚焦,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丰富其研究方法、强化其批判的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以及孕育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新的实践。

一、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路

在《政治经济学、传播与劳动》(Political economy, communication, and labor)一文中,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尖锐地指出:“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外,很少有学者会关注大众媒介与电信产业中的劳动者,关注对大众媒介劳动者的一般性描述以及劳动者的问题,因

此传媒产业的劳工及其阶级形成问题成为了传播研究的盲点。”^①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一般以行政和市场导向为策略,以媒介分析、受众和传播效果研究为重心,因此“劳动”和“劳动者”一直是比较稀缺且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视角。如早期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线性传播模式将传播视为新闻信息传递行为,将传播者视为大众媒介组织,因此其主要关注传播的有效性及其短期或长期的社会影响等问题。^②即使是后来的媒介社会学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分析新闻记者和编辑人员如何应对各种社会力量,构建社会网络,并通过惯例化的新闻生产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过程,如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③虽然媒介社会学视域下的新闻生产研究也会关注记者的阶层、种族、性别等变量对新闻最终产品的影响,但其缺乏对媒介产业生产者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考察。

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同,作为批判研究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聚焦于对传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对宏观的制度权力结构的研究。^④媒介产业的劳动

与劳工问题作为传播过程中诸多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高度关注——以莫斯科、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蒂兹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理查德·迈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 - Witheford)、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邱林川为代表的批判传播学者长期耕耘于这一研究领域。他们从媒介用工实践的现实出发,使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包括媒介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和领域的数字劳工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实证性的研究。^⑤

尤其在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研究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对使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科学话语遮蔽和“迷思化”劳工问题。在他们看来,强调“媒介产业以最低的人力成本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只重微观个体,不重结构性不平等”的窠臼。^⑥与此不同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坚持对资本逻辑渗透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反思,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考察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即将劳动视为价值源头,将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⑦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路存在着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研究维度和框架。首先,从微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个体经验的视角出发,而是强调他们是媒介产业生产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分析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所面临的相同困境以及享有的共同利益与前景,并观照不同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之间(如新、旧媒体)及其与其他产业从业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次,从中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劳动过程、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的变迁,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等议题的分析,旨在揭示出数字时代媒介产业从业者的行动和经历受社会整体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市场的经济属性、规范性制度、国家政策、产业的组织形式等,它们也是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语境复杂性的集中体现。^⑧最后,从宏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社会转型的语境中,这种转型早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从工业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之初就已经开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是这种转型的根本驱动力。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劳动力的加速商品化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过程紧密相连,并探讨这个过程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各国政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政策,以及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形成之间的关联。^⑨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理论聚焦

正是在上述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研究维度和框架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以新闻工作者、动漫创作者、自由作家、出版社编辑人员、新媒体企业实习生、视觉特效师等不同面向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为研究对象,揭示出他们在追求利润与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理念、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替代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不断被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紧密相连,这些议题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理论聚焦。

(一) 聚焦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商品化过程

所谓劳动力的商品化,是指在社会经济中,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地成为交易的对象,而且直接生产者的生存资料,也主要依靠其出卖劳动力而获得。^⑩因此,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已成为资本为纽带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前提。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劳动价值理论的起点,同时,劳动力是根据购买者的需要和欲求进行组织和使用的——这些劳动力的购买者往往是以资本的积累和增殖为第一要义的雇主,因此他们对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存在着特殊且持久的兴趣,并导致劳动力的持续贬值。^⑪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聚焦于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作为不断被商品化的雇佣劳动力,他们所面临的工作强度加剧、工作可替代性增强的困境。杰拉尔德·瑟斯曼(Gerald Sussman)和凯里·希金斯-多布尼(Carey Higgins - Dobney)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电视新闻业的新闻工作者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下,因为生产新闻比购买其他形式的节目成本来得低,所以本地工作日的新闻从2003年的每天3.7个小时增加到2011年的5.6个小时。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为了满足资本对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渴求,不得不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新闻环境中工作,工作强度可见一斑,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闻的质量。^⑫瑟斯曼和希金斯-多布尼进一步研究发现,自动新闻生产技术的推广(以及机器人的使用)使计算机可以替代大量摄像师、音频技术人员、图像生成师等媒介产业中不同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电视台的控制室中,而且还表现在新闻的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编辑、摄像、直播车操作员工作数量的减少和工作职责不断地趋同化。

(二) 聚焦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去技能化过程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商品化与他们劳动过程中的

“去技能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 - Avilés)等学者,在对英国和西班牙6家数字化新闻编辑室进行观察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强调随着数字化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他们所具有的包括调查能力在内的诸多“创造性”能力被“操作性”能力所取代,这一取代使新闻工作者彻底沦为高度依附于计算机的“鼠标猴”(mouse monkey)。^⑬刘昌德(Chang - de Liu)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报社记者的深度访谈,发现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导致了新闻报道工作的琐碎化,记者的经验和知识被贬值,其职业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不断被消除。^⑭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强调的工作“概念”(conception)和“执行”(execution)的分离在媒介产业数字化的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⑮琐碎化的简单劳动不断将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转变为“非技术型”或“半技术型”工人,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指涉的“工作的降格”(degradation of work)在数字化时代的传媒生产活动中日趋严重,即当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因其专业知识和能力被“去技能化”而不得不进行简单劳动时,资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而将劳动力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驱力加速了上述劳动者的具体劳动(依赖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劳动)向一般劳动的转变。^⑯这种转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媒介数字劳工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加速贬值,并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自动化新闻的兴起,这种“去技能化”的工作甚至面临着被写稿机器人取代的危险,届时,新闻记者的劳动所具有的交流价值将进一步被削弱。^⑰

(三) 聚焦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分散化过程

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日趋减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不可逆转地被裹挟进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之中,劳动力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也就是说,ICTs的发展克服了人们之间联系与交往的空间距离与时间障碍,同时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成为可能。^⑱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这种扩张的实质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追求高额利润向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进行的一种经济辐射和政治、文化渗透。这种辐射和渗透的过程往往通过“离境外包”(outsourcing)的方式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纷纷卷入到基于全球劳动分工(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之中。^⑲约翰·兰特(John Lent)通过对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媒介产业动漫创作者经年累月的民族志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跨国公司追求劳动力成本最小化而引发的一系列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最终导致

劳工“双输”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大量动漫创作者面临着工作机会不断减少,甚至是失业的困境;另一方面,接受“离境外包”工作的动漫创作者(他们往往来自于市场发育水平和劳动力成本都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微薄的酬劳、高强度的工作,以及不安全、紧张和孤立的工作环境。^⑳更不用说,劳动岗位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化趋势所导致的劳动力严重同质化的倾向,使资本流动和扩张的逻辑与人类经验价值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尤其表现在上述涉及“离境外包”的生产过程之中。

(四) 聚焦资本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控制和剥削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不断被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的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紧密相连。胡斯以2005—2009年欧盟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的WORKS项目(Work Organisation Restructuring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知识社会重塑工作组织项目)为例,着重阐释了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受“官僚制”“泰罗制”和“市场制”等不同控制形式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矛盾的压力和权力被不断剥夺等问题。^㉑首先,不管是通过赋予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一定的权力,还是通过在办公室内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安排创造出“愉快”的环境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潜能,都体现了资本对劳动过程官僚制的控制形式,这些手段与延长工作时间等陈旧的方法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其次,在全球媒介的生产过程中,离境外包和全球再定位所涉及的将任务和过程的标准化和碎片化强化了管理中泰罗制的控制形式。但是为了无缝地对这些碎片化的劳动过程进行跨时间、跨空间和跨文化的管理,就要求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拥有新的“软技能”,如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动力等——这些都不是泰罗制控制形式所能激发的。最后,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还受到来自市场的控制,即被要求根据顾客所需要的产品,以及以买方确定的价格提供这些产品,在全球市场内,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此外,剥削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本质性的存在而被不断强化。尼科尔·科恩(Nicole Cohen)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媒介产业自由作家的研究,发现资本对他们的剥削无处不在:这不仅体现在他们较低的报酬、较长的工作时间、没有任何培训机会和福利待遇上,还表现为弹性雇佣制度在自由作家群体中的兴起和普遍化。^㉒除此之外,资本对自由作家的剥削还体现在对其无偿劳动时间和版权的侵占上,而且随着正式工作和正规劳动的萎缩,越来越多的个体选择自我雇佣,自由作家的数量也较以往有所增加。因为自由职业缺乏工会组织和集体协商的传统,自由作家数量的增加并没有相应地促进他们谈判

能力的提升,反而加剧了群体内部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劳动力的购买者被赋予了更多的选择权,且他们随时终止合同、更换作者的成本变得非常之低,因此,许多自由作家不得不被迫接受加诸于自身的剥削关系,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实践。

三、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以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过程,以及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的勾连关系为理论聚焦,这些研究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化了其批判的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以及孕育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新的实践,这些也是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一) 丰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劳动不断被“无酬化”,同时他们被加速排除在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外,这种现实困境一直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对象。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不但认识到“无酬劳工”(free labour)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复杂劳动关系中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提出这个概念是理解当代数字经济中“新型的”或者是“半新型的”劳动形式的核心分析工具。^{②3}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的民族志研究,更有不少学者从历史分析的视角对媒介产业的“无酬劳工”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旨在揭示“无酬劳工”是当前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中价值的源泉。

卡琳·法斯特(Karin Fast)等学者强调,“无酬劳工”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并不脱胎于网络化的数字时代,而是受到包括奴隶、护理人员、学徒、勘探者、兴趣爱好者、志愿者和替罪羊在内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七种不同“无酬劳工”类型的影响。^{②4}从历史的维度去研究已存在相当长时间的“无酬劳工”不仅有益于对“无酬劳工”概念进行透彻地批判和全面地发展,而且更能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产业“无酬劳工”形成的根本原因,即当较高的生产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消费者偏好使媒介产业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时,“无酬劳工”的应运而生正是迎合了资本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让劳动者而非企业承担风险的诉求。因此,剥削“无酬劳动”的过程也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相互建构和交织的复杂的历史的产物。历史分析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因为该方法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少量议题的研究之中,这些议题局限于媒介和企业的发展、商品化,以及国家和政府干预的作用等。^{②5}

此外,除了历史分析的方法,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采用社会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将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放置在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即探究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结构性变迁,并尝试建构数字技术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及其与阶级、性别、权力等一系列社会学核心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曹晋和姚建华在分析新媒体技术对中国出版产业编辑人员劳动过程影响的研究中,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将新媒体技术、产业政策和社会结构变迁结合起来,聚焦于作为数字劳工的编辑人员在被纳入现代化的文化生产市场的过程中,面临着个体层面的劳动力贬值、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缺乏安全感和社会保障等诸多困境。^{②6}而这些微观层面的困境与中观层面由政府推动的出版集团化改革和宏观层面的国家“去福利化”政策所导致的等级制度的重构紧密相关。出版社编辑人员的困境是多种权力关系结构压制的产物,这其中既包括社会性别对于女性编辑人员的制度性宰制,又包括弹性雇佣制度对于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征用,后者是当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被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产物。^{②7}这种社会整体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研究社会关系整体性的集中体现,有益于他们在对传播资源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研究中,厘清传播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并不仅仅将传播视为一个独立和专门的过程或研究领域。

(二) 强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其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中始终以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怀疑和不懈的批判为基础,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所进行的整体性反思和深刻的剖析。^{②8}在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中,他们尖锐地揭示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剥削,这种剥削的形式因新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发展而变得更为隐蔽,这不断强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旨趣。如维奇·梅耶尔(Vicki Mayer)和乔斯林·霍纳(Jocelyn Horner)通过对洛杉矶“新奥尔良传媒”网站的实证研究,发现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日常维护、运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免费征用来自学校的实习生劳动力的现象,并对此进行了系统地批判。^{②9}新媒体企业对实习生的剥削可以部分甚至完全绕过现有劳动关系的制约,将大量内容生产、维护、运营的工作以提供实践机会、增加工作经验等为由转嫁给他们,甚至将长时间的“无酬实习”作为最终留用的条件。包裹在天花乱坠的修辞与外表之下的是企业为节省和规避雇佣成本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这种

策略导致劳动的彻底“异化”——实习生并不对他们生产的作品(或成果)具有控制权或所有权,也就是说,资本剥削了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价值。

与此同时,诚如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默多克所强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在于:“它超越了效率这一技术性议题,而专注于正义、公平和公共利益等道德问题。”^③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始终以捍卫民主、平等以及面临着强大的私人利益威胁的公共领域为己任,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在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提出了大量与价值相关的问题,彰显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这些问题具体包括:如何才能帮助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摆脱因受资本的剥削而身心俱疲的困境?^④如何才能赋予“有技能的”和“专业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更多的“议价权”,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抗衡资本对劳动力密不透风的控制?^⑤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以集体组织的方式改变其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组织和政府可以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法规、司法实践及媒体工作组织对中国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通过积极运用“集体协商权”,全面、有效地实现和提升其劳动权益有哪些启示性的意义?^⑦对道德意义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都有着明确的答案,且道德判断往往存在着复杂性,但是将上述问题纳入公共讨论可以使更多身在其中的人群关注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薪酬、工作条件、就业保障、劳动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更能引发他们对ICTs、传播劳动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三) 孕育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新实践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展现的兼具批判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在他们的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身体力行,不断跨越研究和政策的壁垒,积极投身于媒介改革的实践,履践葛兰西所示范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了媒介改革运动中来自学术界的重要力量。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孕育出大量新的实践,以“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研究为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愈发意识到,劳工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和跨国传媒集团的迅速崛起使越来越多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转变为“不稳定”的劳工:对他们来说,低薪、去福利化和弹性雇佣制度逐渐成为新的审查性力量,生活的漂泊感不断增加,对未来的憧憬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而迅速消解。^⑧举例来说,作为加拿大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雇佣的新闻记者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面临着大量的“不稳定性”因素,具体包括从业者规模

的增长、薪酬水平的持续下降、版权斗争激烈,以及对工作逐渐失去控制等。为帮助自我雇佣的新闻记者改善上述状况,科恩呼吁加拿大职业作家协会(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PWAC)和加拿大自由工作者工会(Canadian Freelance Union, CFU)在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他们提供交流平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⑨与此同时,科恩本人也积极投身于加拿大作家组织(Canadian Writers Group, CWG)。该组织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家建立在代理机构—工会合作关系之上、代表自由雇佣的新闻记者的劳工代理机构。它致力于成为加拿大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桥梁,尤其是在协商合同和薪酬方面。

莱昂·古列维奇(Leon Gurevitch)的学术研究长期聚焦于媒介产业视觉特效师。一方面,“去管制化”和后凯恩斯主义指导的政府和市场政策所引发的短期合同制、劳工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弹性积累与剥削制度使视觉特效师沦为没有权利、不享受社会保护的“低端工人”。另一方面,同侪经济所倡导的开放性和参与性加速了包括视觉特效师在内的“新的脑力工人阶级”(new cognitive working class)的形成,他们在“网权制资本主义”(netriarchal capitalism)的宰制下,职业前景变得不可预期,就业保障充满“不稳定性”。^⑩在工会权力不断被消解和式微的情况下,古列维奇积极倡导通过社交网络的建设,将全世界去中心化、高度个体化的视觉特效师联系起来,并有效地传递他们与资本抗争的信息和实践——这不但体现了视觉特效师的主动性和建设性,而且还能成功地唤起公众对他们的关注。ICTs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重新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带动着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转型。^⑪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劳动所不断呈现出来的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过程,他们的劳动过程在信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资本所控制,他们的劳动受到剥削,以及随着国家保护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瓦解,他们的状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甚至沦为“无酬劳工”。有鉴于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为在理论与实践帮助他们摆脱上述困境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启发他们认识到“自在”的现实,并唤醒其“自为”的意识。这不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更益地弥补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盲点与不足。

统而观之,数字劳工研究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之可能的源泉,近年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彰显出批判传播研究与与时俱进,将最

新的技术现象与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针对资本主义对传播领域的渗透进行“内在批判”的旨趣。本文简要梳理了这些最新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并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逐渐迈向人工智能的方向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亦应承担起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重任,及时回应新技术对劳动的影响,如人工智能是否会造大规模灾难性的失业?国家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活”劳动会消失吗?等问题,期待在未来看到更多的研究问世。

注:

- ① Mosco, V. , Political economy , communication , and labor. In: Sussman , G. & Lent , J. (Eds.) , Global productions: Labor in the making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 Cresskill , NJ: Hampton Press , 1998 , pp. 13 - 38.
- ② Katz , E. & Lazarsfeld , P. ,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 Piscataway ,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1966.
- ③【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 ④【加】文森特·莫斯科:《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 ⑤这里需要特别补充和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认为,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和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批判传播研究之间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只是后者更多地关注劳工问题,且强调劳动是价值源头,而非简单地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使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此外,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路径也并非只有上述两种,如大量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对此问题进行观照。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艾德·勃洛克(Aad Blok)和格雷格·唐尼(Greg Downey)合编的《发现信息革命中的劳动,1750-2000》(Uncovering labor in information revolutions, 1750-2000)。18世纪德国的文书工作,1908年印度电报行业的劳工运动,20世纪早期美国电子工程行业的计算劳动力,集装箱化和ICTs对南非装卸工人和国际海员的影响,硅谷的程序员与劳工组织,以及志愿性工作在万维网早期发展中的作用都是该书聚焦的重要研究议题。参见 Blok , A. & Downey , G. , Uncovering labor in information revolutions , 1750 - 2000 , Cambridge ,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⑥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 ⑦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加】凯瑟琳·麦克切爾【加】文森特·莫斯科:《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 ⑧姚建华、徐婧《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与新理论》,《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 ⑨Mosco , V. , McKercher , C. & Huws , U. ,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 London: Analytica Publications , 2010.
- ⑩【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⑪ Braverman , H. ,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4.
- ⑫ Sussman , G. & Higgins - Dobney , C. , The planned obsolescence of TV journalism. In: Maxwell , R. (Ed.) ,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 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 2015 , pp. 230 - 241.
- ⑬ García - Avilés , J. A. , León , B. , Sanders , K. & Harrison , J. , Journalism at digital television newsrooms in Britain and Spain: Workflow and multi - skill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 *Journalism Studies* , 5 (1) , 2004 , pp. 87 - 100.
- ⑭ Liu , C. ,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ers ,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31 , 2006 , pp. 695 - 714.
- ⑮ Burawoy , M. ,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 Chicago ,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9.
- ⑯ Braverman , H. ,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4 , p. 425.
- ⑰ Carlson , M. , The robotic reporter: Automated journalis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labor , compositional forms , 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 *Digital Journalism* , 3 (3) , 2015 , pp. 416 - 431.
- ⑱ Zhao , Y. & Hackett , R. , Media globalization , media democratization: Challenges , issues , and paradoxes. In: Hackett , R. & Zhao , Y. (Eds.) ,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 many struggles ,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2005 , pp. 1 - 33.
- ⑲所谓“离境外包”是指企业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企业外部资源进行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将生产和服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参见 Mosco , V. , Here today , outsourced tomorrow: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 *The Public* , 12 (2) , 2005 , pp. 39 - 56。“离境外包”兴起于制造业,如苹果公司全球最大的合同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但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保持了低成本优势,大量的服务业“离境外包”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如大量呼叫中心大规模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就是其中很好的一例。参见 Brophy , E. ,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 , *Ephemera* , 10 (3/4) , 2010 , pp. 470 - 483.
- ⑳ Lent , J. , The global cartooning labour force: Its problems and coping mechanisms , *Work , Organization , Labour & Globalization* , 4 (2) , 2010 , pp. 160 - 172.
- ㉑ Huws , U. , The underpinnings of class in the digital age: Living , labour and value , *Socialist Register* , 50 , 2014 , pp. 80 - 107.
- ㉒ Cohen , N. , Cultural work as a site of struggle: Freelancers and exploitation , *TripleC* , 10 (2) , 2012 , pp. 141 - 155.
- ㉓ Terranova , T. ,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 *Social Text* , 18 (2) , 2000 , pp. 35 - 58.
- ㉔ Fast , K. , Örnebring , H. & Karlsson , M. , Metaphors of free labor: A typology of unpaid work in the media sector , *Media , Culture & Society* , 38 (7) , 2016 , pp. 963 - 978.
- ㉕ Golding , P. & Murdock , G. , Culture , communication ,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Curran , J. & Gurevitch , M. (Eds.) , Mass media and society , London: Edward Arnold , 2005 , pp. 15

- 32.

- ②⑥曹晋:《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2年第4期;Yao, J., 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Yao, J., Precarious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A study of editors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3 (1), 2017, pp. 63-81.
- ②⑦Cao, J. & and Murdock, G., Holding down half the sky: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Work Organization, Labour & Globalization*, 9(2), 2015, pp. 14-35.
- ②⑧李彬:《批判学派纵横谈》,《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 ②⑨Mayer, V. & Horner, J., Student media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MediaNOLA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university. In: Maxwell, R.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5, pp. 242-251.
- ③⑩Golding, P. & Murdock, 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Curran, J. & Gurevitch, M.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2005, pp. 18-19.
- ③⑪Hesmondhalgh, D., Exploitation and media labor. In: Maxwell, R.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5, pp. 31-39.
- ③⑫Huws, U., Expression and expropriation: The dialectics of autonomy and control in creative labour, *Ephemera*, 10 (3/4), 2010, pp. 504-521.
- ③⑬de Peuter, G.,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 (4), 2011, pp. 417-425; Gill, R. & Pratt, A., Precarity and cultural work in the social factory? Immaterial labour, precariousness and cultural work,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 (7/8), 2008, pp. 1-30; Mosco, V. & McKercher, C., Convergence bites back: Labour struggles in the Canadian communication industry,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3), 2006, pp. 733-751.
- ③⑭夏倩芳、李婧:《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3期。
- ③⑮【加】凯瑟琳·麦克切尓【加】文森特·莫斯可:《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 ③⑯Cohen, N.,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 17/18, 2011, pp. 119-138.
- ③⑰Gurevitch, L.,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tiger's back? Skilled labour, social networks and protest in the digital workshops of the world. In: Maxwell, R.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5, pp. 190-201.
- ③⑱Schiller, D.,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责任编辑:御 风)

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Yao Jianhu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ach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political economists concentrate on the labour commodification, de-skill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processes of various forms of 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 including journalists, cartoonists, freelancers, editors in publishing industries, student interns in new media companies, and visual effects work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se three processes, as the theoretical focal point of digital labour studie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re tightly connected to the control of capital over the labour processes of media workers as well as to the exploitation processes of their work. On top of that, this article further emphasizes the contributions of digital labour stud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digital labour studies enriche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inforces its critical standpoint and its stress on moral philosophy, and brings about many new practices, specifically through the historical and holistic explorations of a few key concepts, for example "free labour" and "precariousness".

Key wor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media industries; digital labour; the labouring of communication